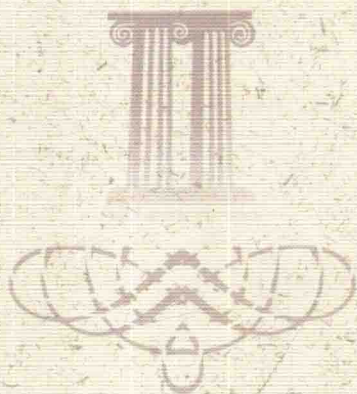


重大法学文库

清末“游西记” 中的“西洋政制”图景

A Picture of “Western Political System”
in “You Xi Ji” at the End of the Qing Dynasty

朱俊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重大法学文库

清末“游西记” 中的“西洋政制”图景

A Picture of “Western Political System”
in “You Xi Ji” at the End of the Qing Dynasty

朱俊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清末“游西记”中的“西洋政制”图景 / 朱俊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8. 6

(重大法学文库)

ISBN 978-7-5203-1311-7

I. ①清… II. ①朱… III. ①政治制度史-西方国家 IV. ①D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85202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梁剑琴

责任校对 闫 萃

责任印制 李寡寡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8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8.5
插 页 2
字 数 308 千字
定 价 80.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重大法学文库》编委会

顾 问：陈德敏 陈忠林

主 任：黄锡生

副主任：张 舫

成 员：黄锡生 刘西蓉 秦 鹏 张 舫

王本存 程燎原 陈伯礼 胡光志

曾文革 齐爱民 宋宗宇 杨春平

张晓蓓 焦艳鹏 张 燕

出版寄语

《重大法学文库》是在重庆大学法学院恢复成立十周年之际隆重面世的，首批于2012年6月推出了10部著作，约请重庆大学出版社编辑发行。2015年6月在追思纪念重庆大学法学院创建七十年时推出了第二批12部著作，约请法律出版社编辑发行。本次为第三批，推出了20本著作，约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编辑发行。作为改革开放以来重庆大学法学教学及学科建设的亲历者，我应邀结合本丛书一、二批的作序感言，在此寄语表达对第三批丛书出版的祝贺和期许之意。

随着本套丛书的逐本翻开，蕴于文字中的法学研究思想花蕾徐徐展现在我们面前。它是近年来重庆大学法学学者治学的心血与奉献的累累成果之一。或许学界的评价会智者见智，但对我们而言，仍是辛勤劳作、潜心探求的学术结晶，依然值得珍视。

掩卷回眸，再次审视重大法学学科发展与水平提升的历程，油然而生的依然是“映日荷花别样红”的浓浓感怀。

1945年抗日战争刚胜利之际，当时的国立重庆大学即成立了法学院。新中国成立之后的1952年院系调整期间，重庆大学法学院教师服从调配，成为创建西南政法学院的骨干师资力量。其后的40余年时间内，重庆大学法学专业和师资几乎为空白。

在1976年结束“文化大革命”并经过拨乱反正，国家进入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新时期，我校于1983年在经济管理学科中首先开设了“经济法”课程，这成为我校法学学科的新发端。

1995年，经学校筹备申请并获得教育部批准，重庆大学正式开设了经济法学本科专业并开始招生；1998年教育部新颁布的专业目录将多个

部门法学专业统一为“法学”本科专业名称至今。

1999年我校即申报“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硕士点，并于2001年获准设立并招生；这是我校历史上第一个可以培养硕士的法学学科。

值得特别强调的是，在校领导班子正确决策和法学界同仁大力支持下，经过校内法学专业教师们近三年的筹备，重庆大学于2002年6月16日恢复成立了法学院，并提出了立足校情求实开拓的近中期办院目标和发展规划。这为重庆大学法学学科奠定了坚实根基和发展土壤，具有我校法学学科建设的里程碑意义。

2005年，我校适应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的需求，积极申报“环境资源与保护法学”博士学位授权点，成功获得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此成就了如下第一：西部十二个省区市中当批次唯一申报成功的法学博士点；西部十二个省区市中第一个环境资源法博士学科；重庆大学博士学科中首次有了法学门类。

正是有以上学术积淀和基础，随着重庆大学“985工程”建设的推进，2010年我校获准设立法学一级学科博士点，除已设立的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二级学科外，随即逐步开始在法学理论、宪法与行政法学、刑法学、民商法学、经济法学、国际法学、刑事訴訟法学、知识产权法学、法律史学等二级学科领域持续培养博士研究生。

抚今追昔，近二十年来，重庆大学法学学者心无旁骛地潜心教书育人，脚踏实地地钻研探索、团结互助、艰辛创业的桩桩场景和教学科研的累累硕果，仍然历历在目。它正孕育形成重大法学人的治学精神与求学风气，鼓舞和感召着一代又一代莘莘学子坚定地向前跋涉，去创造更多的闪光业绩。

展望未来，重庆大学法学学者正在中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时代使命召唤下，投身其中，锐意改革，持续创新，用智慧和汗水谱写努力创建一流法学学科、一流法学院的辉煌乐章，为培养高素质法律法学人才，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继续踏实奋斗和奉献。

随着岁月流逝，本套丛书的幽幽书香会逐渐淡去，但是它承载的重庆大学法学学者的思想结晶会持续发光、完善和拓展开去，化作中国法学前进路上又一轮坚固的铺路石。

陈德敏

2017年4月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问题意识：近代史上的中国如何理解“西洋政制”？	(1)
第二节 研究意义	(4)
第三节 研究现状	(7)
第四节 研究方法	(11)
第五节 相关术语的界定	(14)
第六节 本书的结构安排	(19)
第二章 “旁观者”眼中的“西洋政制”图景 (1800—1866 年)	(27)
第一节 机缘巧合的西洋游	(27)
第二节 “旁观者”立场及其方法	(30)
第三节 猎奇与“西洋政制”观念	(31)
第四节 作为奇观的“西洋政制”制度	(33)
第五节 小结	(35)
第三章 “探索者”眼中的“西洋政制”图景 (1866—1900 年)	(37)
第一节 “探索”西方的原因分析	(37)
一 “游西记”的技术认知	(37)
二 政制与西洋国的强盛	(40)
第二节 “中国行囊”与“以中释西”立场	(44)
第三节 从“中国”理解“西洋政制”观念	(47)

一	“三纲五常”与平等观念	(47)
二	工具理性与自由观念	(50)
三	“治法”思维与法治观念	(54)
四	“游西记”中的现代政体观念	(58)
第四节	中国化与“西洋政制”制度	(66)
第五节	小结	(81)
第四章	“学习者”眼中的“西洋政制”图景 (1901—1911 年)	(85)
第一节	“游西记”的行游立场或方法考察	(85)
一	法国大革命与现代政制观念	(85)
二	现代政制考察的理由与方法	(88)
第二节	挣脱“中国”束缚的“西洋政制”观念	(90)
一	政治上的平等观念	(90)
二	法律下的自由观念	(93)
三	理论中的法治观念	(96)
四	君权下的现代政体理念	(102)
第三节	改革与“西洋政制”制度	(109)
第四节	小结	(120)
第五章	清末“游西记”中的“西洋政制”图景的历史影响	(123)
第一节	“游西记”与清末政制思想	(124)
一	“游西记”对其作者政制思想的影响	(125)
二	“游西记”对清末政制思想的影响	(133)
第二节	“游西记”与晚清政制改革	(137)
一	五大臣的政制考察与晚清政制改革	(137)
二	20 世纪的其他“游西记”与晚清政制改革	(142)
第三节	“游西记”与中国政制的现代化	(144)
第六章	“游西记”考察“西洋政制”的全景省思	(147)
第一节	行游西洋的目的追问	(147)
第二节	行游西洋的立场追问	(157)

一 保守与改良的较量	(157)
二 官方与私人视角的比较	(161)
第三节 “游西记”与现代政制观念的清末初生	(164)
一 陷于纲常中的平等观念	(164)
二 被法律控制的自由观念	(166)
三 司法独立意义上的法治观念	(167)
四 偏向于君权的现代政体观念	(169)
第四节 19 世纪中后期的“西洋政制”实景	(173)
一 女权运动与平等	(174)
二 国家与自由	(178)
三 形式法治的初步形成	(183)
四 政制改革与现代政体	(188)
第五节 清末“游西记”中的“西洋政制”图景与 文化认证	(195)
第六节 小结	(205)
 结 语	 (208)
附录 A 旁观者游东洋：1854—1893 年的游东洋记研究	(212)
附录 B 学徒游东洋：1899—1910 年的游东洋记研究	(228)
参考文献	(267)
后 记	(283)

绪 论

第一节 问题意识：近代史上的中国 如何理解“西洋政制”？

1513年葡萄牙人到达广东，意味着中国人在毫无知觉的情况下进入了“大航海”时代。1598年利玛窦东来，带来了中国文明与西洋文明的第一次亲密接触。此后，中西文化的对话、碰撞、交流便成为常态，双方在这一次次鲜为人知而又剧烈的“幕后”交锋中，并没有分出胜负，西洋从东方获得哲学上的灵感而生机焕发，^① 东方从西洋获得一些常识但并未动摇其儒学的地位。^② 大家“相安无事”。^③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中西第一次正面性的军事较量开启了中西全方位交流的大幕。

西洋进入中国视野，通常有三种途径：其一，以传教士、外交官为首的西洋人在中国翻译西洋著作、撰写关于西洋的文章、在租借地营造

① 参见岳峰发表在《中国翻译》2001年7月刊的论文《东学西渐第一人——被遗忘的翻译家陈季同》、陈超发表在《学术研究》2006年第5期的论文《明末清初的“东学西渐”和中国文化对法国启蒙思想的影响》、陈超发表在《东南学术》2011年第4期的论文《明清之交“东学西渐”的思考——兼论中国文化对法国启蒙思想的影响》等。

② 参见吴岩、李帆《从“改正朔”到“改用西历”——西学东渐下国人传统观念变化的一个审视角度》[《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葛晋荣《“西学东渐”与清初“中西会通”的科学观》(《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4年第5期)、王树人《关于西学东渐的经验教训——兼论话语霸权与“失语症”问题》(《文史哲》2007年第4期)等论文。

③ 参见陆锋明《西学东渐与明末的“西洋学”》，硕士学位论文，苏州大学，2004年。

西洋生活方式等，将西洋呈现在国人面前；其二，部分国人游历西洋，回国后将其关于西洋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思以文字等方式呈现给其他国人；其三，部分国人在中国将国内关于西洋的传说、文章、书籍等或翻译，或编译，向其他国人介绍西洋文明。如此，中西文明交汇开启了文明之间的碰撞与交流，也揭开了西洋文明单向输入中国的近代历史。

一般而言，在有关文明交汇而单向流动的研究中，输入方如何理解这种文明交汇境况，输入方如何理解输入的文明，这种对输入文明的理解又将对本土文明产生怎样的影响，都是必须考虑的重点。因而，这些问题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关键点之一。具体到中国近代的政制，它们是：

第一，国人以怎样的心态来理解“西洋政制”？是高高在上的猎奇，寻找某种中西政制的相异之处，以满足其观赏性或知识性需求？是夜郎自大的不屑，像井底之蛙般坐井观天，拒绝理解任何外来政制？是小心翼翼的窥视，或避免中国士人对“西洋政制”的误解，或探寻“西洋政制”与中国政制相遇的动机？是诚惶诚恐的崇拜，被西洋船坚炮利的表象及其庞大精细的学术体系震撼，这就是强者？是迫不及待的追随，学习“西洋政制”，它才是政制的发展方向？还是冷静而客观的观察，像旁观者一样将“西洋政制”作为研究对象？抑或其他？

第二，国人以怎样的方式来理解“西洋政制”？是背上行囊，以中国文化的方式与视角来阅读、理解？是放下行囊，从学术的角度或“西洋政制”文化自身的角度来理解？是带着中国自身的目的性需求——“富强”与“救亡”^①——来理解？是单纯地在知识性需求层面来理解？是实践性的理解？是学术性的理解？对“西洋政制”的理解或误解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且就现代政制在近代中国的生成而言，传统政制又是如何崩溃的？在这崩溃与生成之间有何文化心路历程？

第三，国人对“西洋政制”究竟有着怎样的了解？是将之理解为一般的行政设置，还是将之理解为国家权力的框架安排？是将之理解为统合

^① 王人博教授在其论文《宪政的中国语境》中即强调，政制是在工具性意义上进入中国的，有“政制—富强”这一文化范式。参见王人博《宪政的中国语境》，《法学研究》2001年第2期。

国家发展力量的方式，还是将之理解为保障人民权利的基本方式？是将之理解为激发国民激情并限制、约束、引导国民发展的制度保障，还是将之理解为保障并促进国民权利并为国民服务的国家权力约束机制？是将之理解为整合神圣皇权运行的方式，还是将之理解为人民主权保障的制度？

第四，国人理解“西洋政制”的过程，一面是抵抗，一面是学习，在抵抗与学习之间究竟存在怎样的关系？即是为抵抗之目的而学习，还是为学习之目的而抵抗？以及为什么要学习，学习什么（这里有学习目标的选择标准），怎样学习，以及学习中有何变化、为何变化、怎样变化，效果如何？这一抵抗又是怎样的抵抗呢？“学生”抵抗“老师”，他是否意识到“老师”是否会将“真功夫”教给“学生”？且通过学习“老师”是否能够抵抗得住呢？如果单纯学习不可能超越“老师”，又当通过怎样的途径超越“老师”呢？

第五，国人如何理解“西洋政制”进入中国的过程与机制？是中国中心观的，强调中国政制发展自有其独立性，“西洋政制”不过是加速了这一进程而已？是“西洋政制”强势入侵而挑战中国政制，因而它不得不小心翼翼地应对这一挑战而寻求各种资源？是现代性体验的，强调“西洋政制”乃是中国政制的发展方向，中国政制当在向“西洋政制”学习的过程中追赶甚至超越？是中西二元模式的，强调中西政制各有不同属性而当各自独立发展，因而对“西洋政制”采取断然拒绝的态度？是采取自我与他者模式，将“西洋政制”作为理解中国政制的又一个视角，以进一步理解并推动中国政制的发展？抑或其他？

第六，国人理解“西洋政制”，理解的效果如何？又对近代中国有何实质性的影响？或者说，在当代中国政制的发展中，“西洋政制”是一个怎样的角色？或者说，在当代政制的发展中，“西洋政制”是否已经内化为中国政制的一部分？或者说，“西洋政制”与中国政制的关系从近代至当代，经历了一个怎样的变化轨迹？为何会有这样的轨迹？这一轨迹又说明了怎样的问题？

因此，近代史上的中国如何理解“西洋政制”乃是政制近代史研究的关键性问题，而本书则立基于自《海录》至《十八国游记》等“游西记”而研究清末国人的“西洋政制”观念与制度变迁，试图据此以部分回答这些问题。

第二节 研究意义

近代史上的中国如何理解“西洋政制”，并非仅是近代史上的问题，它实际上是中外交流的近代案例，即呈现在近代的中外文明交流的特殊案例——被动、单向的外洋文明输入中国而引发中国文明的近代转型。它固然不同于以佛教为代表的古印度文明在汉唐时期对中国文明的影响，但中国文明的主体性却同时存在于这两个案例中。^①与此同时，明末清初的西洋文明输入不论是时间、范围，还是方式均略微不同于清末西洋文明进入中国，但西洋文明的学术强势却是再明白不过的。因而，近代中西文明交流在中国文明史上有着特殊的意义。它的交流时间、范围、方式、途径、内容、影响等，都是研究的课题，能够丰富中外文明交流的理论。

从理解即是翻译的角度看，徐光启当年接受西洋几何、代数甚至天主教观念时，都是通过利玛窦对外文文本的理解以及对汉语语词的理解而转译进行的，因而他提出“翻译—会通—超胜”的原则以强调中外文明交流的方式。这里，利玛窦对外文文本的翻译建立在他对外文、中文的理解之上，而徐光启对外文文本的接受同样立基于他对转译文本的理解。^②刘禾认为：“人们并不是在对等的词语之间进行翻译，不同语言一经遭遇就会产生可译性和可理解性问题，翻译所意味的是不同语言之间假定的对等关系的历史建构过程。”^③即是说，人们是在理解中翻译，通过理解而在不同语言之间建构对等关系以进行翻译，理解是翻译的前提。与此同时，理解也是翻译的目的，译者在不同语言之间建构对等关系正是为他人理解外文文本提供渠道，成功的翻译能让读者无障碍地理解外文文本，而蹩脚者的翻译则恰好相反。因而，“西洋政制”怎样进入中国，从“游西记”角度审视国人为何行游西洋、“西洋政制”为何、如何理解“西洋政制”、怎样评价“西洋政制”以

① 参见王树人《关于西学东渐的经验教训——兼论话语霸权与“失语症”问题》，《文史哲》2007年第4期。

② 参见李志军《实学与西学的互释——西学东渐的学术范式转换》，《孔子研究》2007年第1期。

③ 刘禾：《普遍性的历史建构——〈万国公法〉与十九世纪国际法的流通》，《视界》2000年第1期。

及对中国政制有何影响的研究,确实能够丰富“翻译—理解”理论。

从理解即是实践的角度看,罗尔斯在谈到现代道德哲学问题时解读了“所有信教神职人员和传教士权威的否认者都介于上帝和所有信仰者之间”的观点,认为“这个观点说的是,道德原理和道德戒律在一般意义上能够被道德上合乎理性的人所理解——各学派以不同方式解释了这一点——因此我们能够充分理解我们的道义职责和责任并充分实践我们的道义职责和责任”^①。即是说,实践建立在理解的基础之上,正是基于我们的理解,我们的实践才能够展开。而郑若麟则认为“实践不仅仅是检验中国真理的唯一标准,也是理解西方的唯一捷径”,他借国人对法国最年轻的政治家拉玛·雅德的不同理解而强调,“对同一位人物的命运有着如此不同的解读,这是令人吃惊的。但同时也是好事,证明我们已经开始在动脑筋思考。我们往往是通过书本来了解西方的。然后根据书本上的理论,来印证现实中的西方。当两者出现悖论或矛盾时,我们甚至往往以书本而非现实为理解的准绳。其结果就是我们在头脑中虚构了一个西方。这个虚构出来的西方往往成为中国现实政治的一个参照物。这显然是危险的”^②。与此同时,实践也限制了理解的进一步发展,实践中的理解乃是立基于“前见”而展开的,而作为中外文明观念纠结在一起的“前见”,它以实践的惯性限制着理解,这是相互限制的过程。就现代政制进入中国这一历史实践而言,从“游西记”切入的研究,是在映证理解与实践之关系。

从对中外文明交流过程的反思看,殷国明认为,东方是西方文化发生的历史契机,是西洋文化的寻根之旅,是西方文化发展的持续动力,“丰富的东方文化为西方文化发展提供的不仅是想象的空间和建构的资源,还有静思和智慧”,这是一种文化跨界的行动,“无疑也是西方文化不断解蔽、不断扩展视野、消除自身文化偏见的过程。在走出西方、走进东方的过程中,西方文化不断冲破自身的束缚和偏见,在多种文化中吸取了资源,扩大了视野,拓展了思路,发现了新的路向,也为持续不断的文化创新开辟了道路”^③。而近代以来的中国人阅读西方,则有一种病态心理,

① [美] 罗尔斯:《道德的哲学史讲义》,张国清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3 年版,第 13 页。

② 郑若麟:《我们如何理解西方……》,《新民周刊》2012 年第 48 期。

③ 殷国明:《东方之魅:理解西方思想学术发展的一面镜子》,《中华读书报》2012 年 9 月 26 日第 19 版。

“因为这种阅读方式首先把中国当成病灶，而把西方则当成了药铺，阅读西方因此成了到西方去收罗专治中国病的药方药丸，‘留学’号称是要到西方去寻找真理来批判中国的错误”，这是甘阳、刘小枫的反思，“健康阅读西方的方式首先是按西方本身的脉络去阅读西方。健康阅读者知道，西方如有什么药方秘诀，首先医治的是西方本身的病”^①。此言确属真知灼见。因为在“自我与他者”研究范式中，自我与他者是一对参照系，自我理解他者，一方面自我试图从他者之中寻找到契机以丰富自我，于连对中国哲学的研究不正是如此吗？另一方面也为他者自我理解提供了思路，正如路易斯·哈茨所言，“外国评论家的本事在于能揭示出所研究国家的社会生活中蕴含着思想方面的东西。因为这些评论家往往通过母国文化提供的对照，使异国社会生活中蕴含着的思想显得清晰可见”^②。因而，在“自我与他者”范式中，自我如何确保自我目的的实现乃是关键性的问题，需要尽量避免刘小枫与甘阳所言之弊病。“游西记”研究“西洋政制”进入中国的历程，从文明交流入手，亦是在此范式之中，探寻清末国人身陷此范式的得与失。

从现代国家体系的建构角度看，清末“游西记”对“西洋政制”的记载，是中国人建构现代国家体系的最早努力。当“西洋”进入中国视野的时候，比较政治学即出现某种雏形，中外政制之间的比较随即展开：“西洋政制”是现代政制，晚清政制则是古典帝国，当现代与古典遭遇时，即意味着古典帝国存在着向现代政制转变的某种可能性。事实上，这种可能性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增加，表现为国人在观念、制度层面上从认知现代政制，到认同现代政制，再到推广现代政制，以至于会出现对古典帝国政制的“革命”呼声。换言之，政制的比较意味着变革的可能，而观念与制度的认同则意味着变革的前景，观念与制度的推广则表明革命的必然。而清末“游西记”对“西洋政制”的考察历程，则贯穿了整个政制变革的过程。研究这一认知历程，亦是在反思国人建构现代国家体系的第一次尝试。

当然，中外文明的交流，亦可从中国中心观角度看，从“挑战—回应”角度看，从中外文明二元角度看，这些视角都在展示文明交流对文明

① 甘阳、刘小枫：《重新阅读西方》，《南方周末》，2006年1月12日第30版。

② [美] 本杰明·史华慈：《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叶凤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序言，第1页。

发展意义的不同侧面。总而言之，怎样研究近代史上的中国如何理解西洋文明（政制）都不为过，因为它毕竟是中国文明（政制）发展的关键时期，即转承古代中国文明（政制）而接续现代中国文明（政制）。

此外，近代史上的中国如何理解“西洋政制”，亦具有当代研究的学术价值，即对它的研究与判断能够诊断出当代中国政制发展的问题所在，“以史为镜知得失”即是此意。因而当代法学的人治与法治问题、现代政制与儒学问题、民主实现路径问题、人权问题、自由的界定及其实现路径等问题，都可以并已有大量的研究将视线放在近代，因为这些问题都起源于这一时期，通过追本溯源的考察能够进一步确认问题的来龙与去脉，进而有利于问题的当代解决方案的提出与执行。

第三节 研究现状

因现代化问题的极端重要性，海内外的研究成果不胜枚举。一方面，这丰富了对该问题的探讨；另一方面，却使对该问题的把握更为困难。受范式研究的启发，可将这些研究成果依角度与方法的不同进行分类，以点带面地把握研究现状。据此，可从现代化研究、比较文学研究、“游西记”研究、政制近代化研究的角度来梳理。

从现代化的角度看，费正清、列文森的“挑战—回应”范式开启了解释中国近代史的先河，且作为一个基本的思维方式，其在宏观上框定了中国现代化现象的解释维度。有中国文化大学史学博士雷俊玲的博士论文《清季首批驻英人员对欧洲的认识》等研究成果。但同为美国汉学家的柯文却对此提出了质疑，即中国在面对西方而有所变革时，并非主要是受外在西方的影响，而更多的是中国内部思想与社会发展的必然，或者说反对“历史学家将那些与西方的在场没有什么直接联系的中国近代史的各个层面，界定为不重要，或者说只有当这些层面有助于阐明中国对于西方挑战的回应时，才是重要的”^①。因而，柯文提出了“中国中心观”的研究思路，强调“中国的近代性并不是西方刺激的结果，而主要是由中国社会内

^① 刘禾：《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宋伟杰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39页。

部自我生发出来的”^①。有日本沟口雄三的《中国前近代思想的演变》等研究成果。

但王人博认为,“无论是‘西方中心主义’的‘挑战—回应’范式还是‘中国中心观’都不是观察和分析中国问题的确当的方法和路径”^②。他提出用“物镜—联想—记忆”的范式来思考中国问题,有他与学生的论文集《中国近代宪政史上的关键词》等研究成果。此外,还有“传统—现代”的研究范式,有钟叔河的《从东方到西方》等研究成果。周宪的论文《旅行者的眼光和现代性体验:从近代游记文学看现代性体验的形成》^③,是从现代性体验角度进行的研究。

从比较文学或跨文化研究的角度看,乐黛云与汤一介主持的跨文化对话系列可以说是国内比较文学研究的先河与典范,但其基本上是从中西文化对话或个案角度出发,并未对“游西记”进行系统研究。孟华的《他者的镜像:中国与法兰西》作为海外学术演讲录,在“游记研究”部分,从比较文学形象学的角度讨论了17—18世纪法国人的中国游记与中国人的法国游记,其重点在王韬的《欧游漫录》与张德彝的游记上面。刘禾的《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作为既从翻译理论角度,又从跨文化角度出发的力作,强调“中国现代史的研究必须充分考察跨语际实践的历史。语言问题在中国的现代性想象中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④。萨义德在谈到美国批评理论的时候,用“理论旅行”范式进行研究,而这种研究的思路也被引入中国近代史的解释当中。研究成果有中国政法大学朱清艳的硕士学位论文《试论卢梭形象的变迁》等。郭少棠在其专著《旅行:跨文化想像》的第四章《行游、文化转化与价值变迁》中以极小的篇幅讨论了中国近代史的问题,他认为,“中国的留学运动(如果可以称为运动的话),对中国当

① 参见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林同奇译,中华书局2002年版。

② 王人博编:《中国近代宪政史上的关键词》,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61页。

③ 参见周宪《旅行者的眼光和现代性体验:从近代游记文学看现代性体验的形成》,《社会科学战线》2000年第6期。

④ 刘禾:《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宋伟杰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38页。